

杭州南山路由柳浪闻莺经涌金门至湖滨这一段,是我早年经常走动的去处,柳浪闻莺对面不远是浙江美院。湖滨那头则有个杭州书画社,书画社除卖书画及文房四宝外,在楼上还有一部分古旧文房杂件出售,但是作为内部供应的,由吴昌硕之子吴东迈先生管理。

在这段路上经常会看见一位朴实的长者,沿湖散步。美院的学生无论是行路或在路旁写生,见到长者都会鞠躬,而长者也频频点头示意。我当时想这长者一定是美院的老师,也就多看了几眼。后来有次陪祖父盖叫天去政协开会,又见到了这位长者,而且与我祖父一个小组,我才知道这位长者是大画家潘天寿先生。我祖父这一组有灵隐寺方丈大悲和尚、名中医叶熙春、文史学家张宗祥,为他们张罗活动日程等琐事的是周天初先生。周先生画得一笔好画,他告诉我政协经常有联欢活动,有演唱会、舞会,还有诗画会,叫我下次陪祖父来开会时带本册页,他可介绍我认识画家,请画家画册页。

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一个除夕,我陪祖父参加政协联欢会就带了本册页去,在活动进行中,周天初先生介绍我拜见了张宗祥老先生,张老为我画了枝水仙,题曰“孤芳自赏”,那年张老已经七十八岁了。正好潘老从诗画会吟诗回来,天初先生忙把我拉到潘老身边,潘老人很随和,见我喜欢画,就在我册页上画了岩石雏鸟,册页虽不

可园杂忆

潘天寿先生赐我墨宝

——西子湖畔几段缘之二

◆ 张大根



李楚材诗书永留香

◆ 宋连庠

墨宝传情久,诗人结缘深。在我琳琅多彩的藏品中,有直条一幅,是老教育家、海上名师、格律诗人李楚材先生(1905—1998,江苏常熟人)86岁时,应我之求,冒暑以劲美秀雅的行书,于1991年夏赠我的,写的是曾发表于《夜光杯》上的一首情深意长,对仗工整的七律(见图):“教师久被誉园丁,慧剑须磨愿作砭。华屋奠基深挖洞,夜空方位仰繁星。励徒拼搏烧红烛,自我牺牲化草萤。甘为人梯度孺子,工程旨在塑心灵。”诗人对作为“人类的灵魂工程师”的孺子牛的广大园丁,进行了由衷的赞颂,并殷望老师们能像“燃烧着的红烛”与“磨砺慧剑的砭(磨刀石)”那样,富有“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诗书双美,意味悠长!

楚材先生长我24岁,本乃师辈之人,然蒙先生厚爱,以忘年交相许。十多年前,我应邀常去襄阳南路先生小楼,品茗赏画,谈诗论书,情趣相谐,其乐融融。有一夜,楚材先生还兴致盎然地邀我同去观赏尚长荣与言兴朋合演的历史京剧《曹操与杨修》……

李楚材早年在“晓庄师范”学习,生活。深受陶行知(1891—1946)办学思想与高尚人品的熏陶,并赢得陶先生的器重。陶行知在为李楚材所著《破晓》一书的《序》中说:“《破晓》不是写真,而是传神”,让自己“感到楚材的心灵和晓庄的精神在纸上的活跃”,“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一个一贯的人生观,这个人生观是什么?是诗,在晓庄一切诗化:困难诗化,所以有趣;痛苦诗化,所以可乐;危险诗化,所以心安;生死关头诗化,所以无畏。这是建设的达观主义,也可以说是创造的乐天主义。”陶行知的赞语,足见晓庄师范对李楚材的人生观及其后来的办好学校,具有何等深远的影响!

抗战期间的1943年,楚材接办“位育(校名典出《中庸》‘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学”。当时敌伪统治极严。酷爱古典诗词的李楚材,要求教师要在课堂上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特别在语文课时,引用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过零丁洋》、陆游的《示儿》等充满爱国激情的诗词和人民抗击侵略的英雄事迹,以激发莘莘学子的爱国赤忱。

李楚材怀有真善美的心灵。有其于1991年5月19日发表在《夜光杯》上的小诗《迎麻雀》为证:“窗开一任雀来临,墙角袋中跳跃寻。啄米叽叽欢小唱,爱听都市自然音。”唱出了一位耄耋老人对自由飞临小屋墙角,一边啄米一边“叽叽小唱”的“都市自然音”的无限慈爱之心曲。

楚材先生羽化登仙迄今已近十年。灯下细赏其墨宝,诗幅中仿佛又映出诗翁慈蔼暖人的音容笑貌,不禁使我从心坎里升起一股情味悠长的清香……



雨花石蕴含万物,风情万种。

游动的鱼,飞翔的鸟,绽放的百花,无不给人生机盎然的欢愉。

蔚蓝的海,翠绿的山,奔腾的急流,无不给人辽阔壮美的感受。

美石里总有说不尽的风流。

美石里总有讲不完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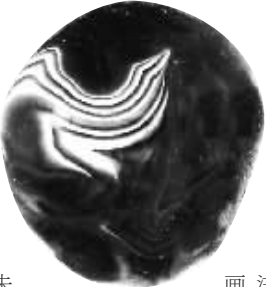
在夫子庙的石摊上,从大盆里淘到一块其貌不扬的黑色玛瑙。石头黑得烟熏火燎一般,只有几道白色的线条比较醒目。当时未看出那线条的含义,只是觉得奇妙生动。回家把它放在清水里,庐山露出真面目,一幅绢本的古画映入眼帘:那几道曲折的、流畅的白色线条,组成了一只羽毛丰满的吉祥鸟,昂首向上,尾巴翘起,双爪运力,振翅欲飞。

瞬间,我感到它也有难以割舍的情结。那自由的天空虽然是它向往的地方,

振翅欲飞

——美石遐想

◆ 孙友田



一日,宫中宣和殿前飞来一只孔雀,徽宗令其身边的画家描绘,画家们各显其能,从不同角度描绘孔雀,其中有几幅画的是孔雀正在登上藤墩。徽宗观后说:“画得不对。”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所以。几天后徽宗再次召来画家询问,画家们仍然不知所以。徽宗说:“孔雀升高先抬左腿。”至此,画家们才猛然醒悟。

而青枝绿叶仍是它留恋的故乡。

由于年代久远,绢已变成黑褐色,呈现古朴的美。右下角的图章印记依然鲜红如初。

看到石头上呈现的这幅古代花鸟画,想起了900年前的宋徽宗。

宋徽宗赵佶是北宋第8位皇帝,在位26年,享年54岁。政治上昏庸无能,艺术上却才华横溢,能书擅画,尤精于花鸟,代表作有《芙蓉锦鸡图》《写生珍禽图》等。其绘画,注重写生,善于观察生活。一日,宫中宣和殿前飞来一只孔雀,徽宗令其身边的画家描绘,画家们各显其能,从不同角度描绘孔雀,其中有几幅画的是孔雀正在登上藤墩。徽宗观后说:“画得不对。”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所以。几天后徽宗再次召来画家询问,画家们仍然不知所以。徽宗说:“孔雀升高先抬左腿。”至此,画家们才猛然醒悟。

众星拱月

◆ 宋康年

据考证,水盂,古时又称水滴,作为贮水磨墨之器皿,与砚台为伴。其历史可追溯至汉魏时期。汉代刘昫在《西京杂记》中说道:“晋灵公冢甚瑰状,其物器皆朽烂不可别,惟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王取以为水滴。”宋人赵希鹄在《洞天清录集》中还专立《水滴辨》,他说:“余尝见长沙同官,有小铜器型如桶,可容今一合,于右军研水孟,底内有‘永和’字,此必晋人贮水以添砚池者也,古人无水滴,晨起则磨墨斗盈砚池,以供一日用,其不复磨,故有水孟。”

1984年秋望江县开始文物普查工作时,在农村发现一座宋代墓葬出土的一件带砚五联孟(如图)。当地农民见到此件器物,甚感诧异,不知是何物,便把它献给文物部门,现藏县博物馆,经专家鉴定为一级文物。该器物通高4.5cm,直径14.5cm,砚面径6.3cm,每只水孟口径3.2cm,质地系青白瓷,晶莹圆润,制作较精细,造型也较奇特,周围以五个大小相等的小水孟连成一圈,把一个好似圆形月亮的砚台团团围在中央,其砚台稍稍隆起,周围环绕有一水槽,水孟呈腰鼓形状,口径与底径相若,平底,饼圈足,整个器型设计精巧,科学,既具有美观雅致之感,又富有实用方便之优点。这种带砚五联孟的造型,究竟是怎样构思形成的呢?

一是从“五”字的词汇启发而来。如

古时有“五车”、《史记·天官书》《晋书天文志》等书记载:“五车、星名,属毕宿,共有五星也叫五潢。”又《庄子·天下》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后以五车称人之博学。“五德”指儒家应以温、良、恭、俭、让为修身五德。“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岳”即东岳泰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五品”即“五伦”社会人际关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星”、“五星联珠”:《史记·天官书》:“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即金、木、水、火、土。除此还有“五子登科”“五世其昌”等等,不胜枚举。由于这些词汇,均具有较为浓厚的吉祥寓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历来为人们所崇尚。

二是由“众星之拱北辰”这一成语引发而来。《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官应如此,做学问的人,又何尝能例外?

三是从实用的观点出发,水孟与砚台连在一起,使用起来既方便省力,又节约时间,也可能是制作者的初衷。

从这件带砚五联孟的制作、造型、瓷质、瓷釉等方面来看,均较为精细、新奇、光亮、柔和、美观、雅致,充分体现出宋代景德镇窑产品的风格以及其制作者的审美观,该带砚五联孟尚属不多见之物,弥足珍贵,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满一尺,但潘老的画是小中见大,气势恢宏。由于印章没带,潘老叫我过几天去他家补印。

那时我还在祖父家学戏,很少出门。隔了一段时间我抽空去南山路诸乐三先生家拜访,诸老看了我的册页告诉我,张宗祥老先生很少给人画画,被你求得真是福气;又看了潘天寿的画,更是拍手叫好,难得难得,小画大章法。见没有盖章,便叫其子诸涵送我去潘老家。

潘家与诸老家很近,有点洋式,一个小院落,石阶三五,两旁一是卧石一座,一是古松一株,极雅。拾阶进门是个大画室,最注目的是画桌,足有近三米长,一米半宽,文房用具皆是晋窑瓷砖、拳石等成之,无一点尘俗之气,窗台很宽,每扇窗台上都有供石,因潘老极爱玩石,每块供石亦是潘老作画的范本。诸涵代我说了来意,潘老叫我打开册页,看后说,联欢会上的笔不好,墨色也不行,我得加上几笔再盖章。说完拿起笔蘸了墨在雏鸟身上又重画了一遍,又用焦墨在岩石上点了数点,满意地说,现在行了,补上印章。我跟诸涵在旁被潘老这几笔摄住了,连大气也不敢出,这小小不满尺之地,竟有这么大的气势。

谢过潘老回诸老家,诸涵对诸老讲了经过,诸老看了画后说,太精彩了,真是大手笔,也勾起了画兴,为我画了一幅画,题曰“露甲烟芽供一饱,欲与天地同长春”,写完哈哈一笑,谦虚地说,笔力不及潘老甚也。

青铜块的“身份”

◆ 徐云子

我藏品中有两块青铜块,满身斑斓绿锈凝结了悠久历史。它们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很不规则。一块重115克,一块重64克。其貌不扬,身世却令人瞩目。它究竟是什么“身份”,至今还众说纷纭。

1975年5月,江苏省金坛县城东乡鳖墩土墩墓中,出土了二百多块大小不一的青铜块,其中最轻的仅1克,最重的达1875克,共重75公斤。邻县句容、溧水、丹阳等地,也多次有青铜块出土。金坛鳖墩出土的青铜块,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C14测定,距今2820±150年,相当于西周中晚期,也即吴国的中叶。有学者认为,它是吴国的称量货币(1983年第三期《中国钱币》,徐永年《对吴国的称量货币——青铜块的探讨》)。

此论一出,立即在钱币界“一石激起千层浪”,有赞同的,也有不赞同。有不同看法的学者指出:“宁镇及苏南一带的西周墓中,从未发现天平、砝码之类的计量工具及切割工具,不知大小轻重如此悬殊的铜块将如何计量、分割。”(钱公麟、周传元《江苏钱币·江苏钱币学会成立十周年专辑》)

又有学者补充说:“也许古代人计算商品价值要比现代人简单得多,可以毛估,双方认可,即可成交。这种交换方式,如今在偏僻的山村仍可见到。这种不用斗量,不用秤称的交换,由于商品形体不定,是不具备价值尺度的,它只是彼此商量着办的相互交换,也就不能命名为‘称量货币’。”(殷光中《补订集》)

我认为上述意见有一定道理。在人类历史上,早期生产和交换的各个阶段,牲畜、谷物、布帛、兽皮、农具、珠玉、贝壳等,都充当过实物货币,以物易物。青铜块既是制造器具的重要原料,又是可以贮藏的财富(而且并非一般人所能拥有),无疑在所有商品中占有不同凡响的地位,但也只能是实物货币。

因为真正的称量货币,例如楚国使用的金版,虽然形制也没有铸币规整,而每块版上都有戳记,如“郢爱”、“陈爱”、“专爱”、“郢爱”等等,“郢”、“陈”等指地名,“爱”指重量,一“爱”到底有多重,尚待研究,但说明它有一定的价值尺度。后来所使用的银铤,也铸有重量。那些民间所铸未标明重量的银铤,以及市场上使用的碎银,它们都是通过称重量和看成色来确定其价值。它们才是当之无愧的称量货币。

因此,在尚未发现与青铜块“年龄”相同的计量工具和切割工具前,青铜块的“身份”还无法定为称量货币,仍是实物货币的一员。

